

越境的鲁迅研究 ——小田岳夫《鲁迅传》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孙立春 李天然

内容提要：小田岳夫所著的《鲁迅传》是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在1940年代中国的不同地域出现了单外文、范泉等4个中译本，且各个译本内容也不尽相同，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状况及时代背景的差异。此外，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还对王士菁等人的《鲁迅传》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创作及其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为载体，揭示了鲁迅研究越境到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时所产生的种种变异，以及1940年代鲁迅研究的“中日互证”之状况，突出了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小田岳夫 《鲁迅传》 译介 越境

作者简介：孙立春，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邮箱：sunlichun79@126.com。

李天然，博士研究生，日本熊本大学社会文化科学教育部。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Lu Xun Studies Crossing the Borderline: The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Takeo Oda's *Lu Xun: A Biography*

Abstract: Takeo Oda's *Lu Xun: A Biography* is the first complete biography of Lu Xun in the world. After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Japan in 1941, the book has been reprinted with several adapt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periods in Japan, which shows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attitudes towards Lu Xun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60s in some perspectives. The book was also translated to China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content of various versions is also different. Besides, this

biography has also influenced Lu Xun biographies in China, such as Wang Shijing's *Lu Xun: A Biography*. This research aims to argue that the conditions of Lu Xun research vary with both time and space as revealed in Oda's work and its translations, and to rediscover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akeo Oda, *Lu Xun: A Biography*, translation, border-crossing

Sun Lichun,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mail:** sunlichun79@126.com.

Li Tianran is a PhD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s, Kumamoto University, Japan and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在传统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之下，小田岳夫是一个处于文学版图边缘的作家。但若是鲁迅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小田岳夫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小田岳夫1941年3月在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鲁迅传》，是世界上第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鲁迅传》在日本出版之后，国内研究者第一时间便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开始着手译介工作。古大勇和翟勇在其研究中提到国内存在任鹤鲤和范泉的两个《鲁迅传》中译本（35），但据笔者所知，在1940年代国内至少出版过4种中文版《鲁迅传》。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译本有两种，分别是伪满州国艺文书房1941年出版的单外文译本和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的范泉译本。而1945年由上海星洲出版社出版的任鹤鲤译本和同年由北京艺光出版社出版的夜析《鲁迅先生的一生》，则基本照搬了单外文译本的内容。任鹤鲤译本前两章文面表达与单外文译本有些出入（例如将“第二年”改为“翌年”），但除去有关周作人的内容之外，其内容的添削取舍与单译本完全一致，应是以单译本为蓝本复述而来。从第三章开始则文面表达也与单译本一致。夜析译本除去个别修改外，基本与单译本一致。此两者严格来说并非译本，本文为论述之便暂以“译本”称之。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作者自身看法等诸多原因，各个译本对于原作内容多有删改，而范译本和单、任、夜三人的译本在删改倾向上的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不同的历史和政治条件所造就的文化场域对翻译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本



文将以译者对文本的删改为中心对4个译本进行比较,试图探究1940年代关内外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对翻译行为造成的影响。由于任鹤鲤和夜析译本总体上是单译本的翻版,因此以下将主要对比单译本和范译本之不同,捎带提及任译本和夜译本不同于单译本之处。

一、《鲁迅传》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

(一) 单外文译本

伪满洲国的单外文译本是最早的《鲁迅传》中译本,在原版《鲁迅传》出版的同年便由艺文书房出版发行。在当时伪满洲国文坛的“多语系统的创作背景”(李文卿 43)下,由单外文翻译的日本作家小田岳夫著的《鲁迅传》可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文化产物,而该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关外鲁迅思想传播过程之曲折和不易。

对于当时的伪满洲国当局来说,鲁迅既有可利用之处,又有不得不忌惮之处。在战争时期“日满一体”“民族协和”的所谓政策之下,有留日经历且在东亚文坛举足轻重的鲁迅自然是宣传的理想对象。例如大连书店版的杨一鸣《文坛史料》所收陶晶孙、柳雨声、周越然等人的纪念文章便是站在“日中亲善”的立场上,将鲁迅打造成日中友好之桥梁(李文卿 44-45)。但与此同时,鲁迅形象所包含的政治性和其左翼文学家的身份却是当局所忌惮的,这也是当局在自身的话语体系之外严格禁止鲁迅思想传播的主要原因。特别是1936年6月“黑龙江民报事件”之后,当局开始严打左翼思想之传播,凡有涉及“抗日”“反满”“革命”等思想的刊物全部被查禁。在如此恶劣的文坛生态之下单外文翻译的《鲁迅传》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版该书的艺文书房及主编古丁与伪满当局关系较为密切。国内学者徐利指出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出版便是源于日本战时对于中国的“知识关切”(徐利 34-36)。而艺文书房正是日本当局主导的所谓“鲁迅研究”在伪满州国的代理人,不仅负责了改造社7卷本《大鲁迅全集》在伪满洲国的印行,还刊行了大量与鲁迅研究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单外文翻译的《鲁迅传》虽然借了日本及伪满当局同意进行所谓“鲁迅

研究”之际，但从他对原作的大量删改中，依然可看出当局对于鲁迅思想传播的掌控之严苛。

单外文在翻译中删改的重点之一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内容。小田岳夫《鲁迅传》的一大特色就是将鲁迅的经历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并置，将鲁迅放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而单译本则大量删除了这一类内容，对鲁迅的经历进行了“去语境化”的处理。由于伪满洲国的特殊性，在单译本中涉及清末的国民革命和民国成立始末的内容大都用“大事件”一类的字眼一笔带过，有的甚至直接删除。这也体现了伪满当局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国民革命及反清一类的内容讳莫如深。这一点在某些具体事件的叙述当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徐锡麟被害后，鲁迅等人商讨是否发电报的部分中，单外文删除了“革命志士”一词以及反政府的内容，将“诘责政府的无道”的电报改为“吊电”，这显然都是为了应对伪满当局的审查。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原文中“殺した奴は殺しちゃったんだし、死んだ奴は死んぢまたんだ”（小田岳夫 53）一句的翻译。范泉按照原文译为“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范泉译本 24-25），但单外文仅译为“死的死掉了”（单外文译本 20），使整个事件的性质由谋杀变成了自然死亡。从诸如此类的细节当中，不难看出其翻译过程如履薄冰，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伪满当局对清末革命相关事件近乎神经过敏的避讳。

单译本删改的另一重点是关于日本的内容。上文已经提到，单译本《鲁迅传》出版前后的伪满文艺是“多语系统的创作背景”，但这种“多语系统”无疑处在日本方面的支配之下。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单译本删除了所有有关抗日的的内容，这自不必多说。除此之外，有关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等事件的内容也都遭到删除。不仅如此，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叙述中也能看到这种“为日本讳”的情况。例如在有名的“幻灯事件”部分中关于中国同胞因做了俄国的间谍而被日本兵枪毙的段落被单外文修改成了“看见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在一群中国人围观之下被枪毙了”（单外文译本 1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涉及日本自身的内容在日本本土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尽管“抗日”等字眼被施以伏字处理），但伪满当局反而对此讳莫如深。这反映了殖民者在本土和殖民地所实施的文艺管制方针的差异：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文艺政策要更加注重本国形象



的塑造以及对反日民族情绪的压制。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伪满洲国文艺界管控之严，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殖民者在对殖民地进行文化管理时如履薄冰的心态。

最后，单外文译本中关于共产主义和左翼文学的内容也存在大量删改。例如在论及国共分裂的情形时，便将“鲁迅周围的学生也有很多因有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范泉译本 70-71）改为了“学生因嫌疑而被捕”（单外文译本 69）。从类似改动中不难看出当局对于共产主义的忌惮之深。值得注意的是，单外文对于有可能违禁的内容并非总是一删了之，对于原作中的一些敏感词汇或段落，译者对其稍加遮掩以求读者心领神会。例如单外文在翻译时将“国防文学论”改为“新文学论”，再如将“左翼文艺”改为“前进文艺”，将“革命文学”改为“激进文学”等等，诸如此类的修改乍一看会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方式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的。在战争期间的伪满文坛，鲁迅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在左翼文学家们组成的秘密结社之间进行的。而战争期间伪满当局的审查制度对“反满”“抗日”“革命”等显性符码的压制使得结社内部形成了类似人类学家霍尔所提出的“高语境（High Context）”的传播环境。霍尔指出：“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传递，或内化于交际者的思维记忆深处，显性的语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转引自段晓芳 44）单译本中对于左翼相关内容的改写事实上就是将显性符码置换成需要一定语境才能理解的隐性符码。单外文在替换时所选择的“前进”和“激进”等词仍然包含了某种左倾的革命意味，加之与原先的词汇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因而这些新词汇很有可能是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家圈内通行的“暗语”。这种表达方式既保证了左翼文学家能够理解其内容，又逃过了当局的管制，充分体现了译者在严酷的创作环境中体现出的宝贵的主观能动性。

总的来看，单译本限于伪满当局严格的审查制度而对原文做出了大面积删改，导致原文的内容脱离了时代以及作者思想之语境，使其中鲁迅思想的形成和转变显得较为生硬。但单译本中对于词语和段落的巧妙替换，又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伪满文坛左翼作家之间的“高语境”传播方式存在的可能性。

(二) 范泉译本

范译本《鲁迅传》出版于1946年9月，但本书早于1941年便已经译成，原稿被日军损毁后于1942年重译，并于翌年交与开明书店（钦鸿 46）。其部分内容从1944年10月10日起就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丛刊》上进行了四回连载，内容分别是《鲁迅先生的晚年》《鲁迅先生的上海生活》《鲁迅传断片》《鲁迅先生的青年时代》。连载版的四回《鲁迅传》较之1946年出版的《鲁迅传》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文面略有不同，说明连载所用的手稿有可能并非1946年出版时所用的手稿；二是删除了部分事件中的对话等细节，例如钱玄同探访鲁迅时谈话的具体内容（范泉，《鲁迅传片段》70），这一类删改应该是限于杂志的篇幅；三是删除了部分历史背景，这应该是限于日伪当局的文艺管制。关于第三类删除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单译本对于敏感事件的全盘删除，范译本中对历史背景的删除体现出选择性、地域性特征。例如在《鲁迅传断片》中的“呐喊”部分，删掉了发生于上海的五卅惨案的具体内容，却保留了北京章士钊的复古运动风波和“三一八惨案”的具体细节（73）。这也体现出上海日伪当局不同于伪满当局大东亚主义的地方主义倾向。此外，在单译本中被删改的“共产党”和“左翼文学”等敏感词汇在连载版《鲁迅传》中都得到了保留。从整体来看，《文艺春秋丛刊》连载的四回《鲁迅传》的内容较单版本更为完整，删改之处也少得多。这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日伪当局的报刊审查制度远不如伪满当局严厉。日伪当局当时规定期刊必须向当局登记注册，而丛刊则不必，范泉便是利用这一点使刊物免受审查。二是范泉十分善于自我保护，表面上恪守自由立场，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使日伪当局抓不到他的把柄，无可奈何（钦鸿、闻彬 73-74）。

而范泉译的《鲁迅传》的最终出版则是得益于战后国民党当局书报审查制度的变化。1945年8月至9月间，国统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9月22日第十次常务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议。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范译本《鲁迅传》终于在译成五年之后于1946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较之单译本以及《文艺春秋丛刊》上的四回连



载,范译本完整地保留了原书的内容,少有迫于政治压力而删改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该书就完全没有改动,只不过范泉的删改大多出于与小田岳夫之鲁迅观的分歧。在发表于《文艺春秋》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上的《关于〈鲁迅传〉》一文中,范泉便直言“由于鲁迅思想的广博,由于原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有着不少的严重错误的”,因此“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译者特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范泉,《关于〈鲁迅传〉》50),不仅如此,范泉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夏丏尊的帮助。许广平尔后在为王士菁《鲁迅传》所作的序言中,对范泉所说的“校订”表明了异议,认为自己只是“曾借予几本鲁迅著作以为查检一些引证鲁迅作品的文字”,并非是“校订”(许广平1)。但无论如何,范泉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范译本中的修改和订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原作中史实的错误,二是范泉与小田岳夫的鲁迅观之分歧。从后者可以看出当时中日鲁迅研究者在鲁迅观上的一些重大差异。

关于史实的错误,范泉在《关于〈鲁迅传〉》附记中一一列举(52-53)。例如,小田在叙述自己探访鲁迅北京八道湾故居的经历时说,鲁迅的母亲和妻子应该“仍然住在那里”。而根据范泉的说法,此处乃是作者小田岳夫“凭空臆测的错误”,那房屋是由“周作人一家独自居住,鲁迅的母亲却仍然孤零零地住在阜成门内鲁迅自置的小屋里,一直到她亡故的一天”(53)。此处体现了与许广平等鲁迅研究者熟识的范泉在资料考证上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史实的错误,更值得关注的是书中体现出的范泉与小田岳夫的鲁迅观之分歧。范泉对小田鲁迅观的不满主要源于后者忽视了鲁迅反抗者和战斗者的一面。例如小田岳夫在谈及鲁迅抄录古籍的工作时,认为鲁迅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乃是其自身文学的重要基础,体现了鲁迅对国文学的“自信和迷恋”(小田岳夫86),因而他后来倡导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古典乃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范泉则认为鲁迅研究古典乃是当局钳制下的一种“掩蔽当局注目”(范泉译本38)的方式,是其反抗策略的一部分,其内心并非赞成研究古典,因而也不存在前后思想的矛盾。再如小田岳夫在谈及“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时,从日本文坛当时的状况出发,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国防文学”或“抗日文学”并非是

独立的文学运动，只不过是左翼文学为了摆脱当局的压迫所戴的“假面”而已（小田岳夫 196）。小田岳夫的此类理解消解了鲁迅作为文化战士的形象，而范泉在翻译时显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删除了原文中的相关论述。

总的来看，尽管仍然有迫于当局管制而删改的部分（例如删掉了北伐时期“南京事变”的内容），但较之单译本对鲁迅思想的全盘接受，范译本更多地体现出国内鲁迅研究者在接受外国鲁迅观时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加富有思辨色彩。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当时上海的鲁迅研究较之其他地域确实更为深入，主体性也更强。

（三）任鹤鲤和夜析译本

此外再稍稍提一下任译本和夜译本。这两个译本的文本大致上与单译本相同，但细枝末节之处也体现出其独特性。上文已提及夜译本不同于单译本的地方，在此主要说任译本。任译本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对周作人的态度上。他在第一章提及周作人时，特意加注说他虽是“学贯中外的文学者兼随笔家”，但是“他的节操，就远不及他的兄弟，并且现是个附逆者”（任鹤鲤译本 10），并删除了原作中关于周作人初恋的一段轶事。任译本对待周作人的态度，也体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文坛对于周氏兄弟的主流评价。

如上所述，各个译本删改的方向各有不同，体现了抗战时国内鲁迅研究的地域性和多样性，这也反证了鲁迅经历及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

二、小田岳夫《鲁迅传》对 1940 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的影响

如前文所说，小田岳夫《鲁迅传》在 1940 年代就出现了 4 个中译本，尤其是范译本，对我国 1940 年代后期的鲁迅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我国第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王士菁的《鲁迅传》当中。

在鲁迅逝世十一年后的 1948 年 1 月，也是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出版近七年之后，王士菁的《鲁迅传》作为第一本由国人撰写的鲁迅传记姗姗来迟。由于早在这本传记诞生之前，中日两国便已经各自开始了对于鲁迅的研究，而



且日本的研究成果借由国内译者的介绍而进入国内鲁迅研究者视野的也不在少数,因而无论是本书作者王士菁还是为本书作序的许广平,都展现了一种时刻将日本的鲁迅研究纳入视野的跨国思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本书也可以说是早期“中日互证”的鲁迅研究状况的缩影。而当时王士菁和许广平等鲁迅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日本鲁迅研究,显然就是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当时国内的鲁迅研究者在看待王士菁的这本传记时,也多将其与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做比较。

王士菁的《鲁迅传》由许广平作序,但序言大半是在谈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序言开头便说“鲁迅传在中国刊行的有一种日人小田岳夫的译本”,而王士菁《鲁迅传》的出现终于“弥补了多年的缺憾”,可以说开篇便将本书放到与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比较的立场上(许广平1)。上文已经提到,范泉翻译《鲁迅传》时,更正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而许广平在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小田岳夫的一些谬误。其一是小田岳夫认为中国文人“不肯做汉奸”是因为“把鲁迅当作文化战神”,而许广平认为“这太抹煞各文艺工作者自己崇高的认识”,因而“不大同意”(1)。其二是小田将鲁迅的“攻击时弊”作为日本“为民伐罪,深入中国”的借口,许广平认为这是“非常恶毒的写法”(2)。在此处,许广平同范泉一样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潜藏在小田岳夫《鲁迅传》深处的、中日研究者的鲁迅观之差异。因此对于许广平等鲁迅研究者来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与其说是榜样,不如说是探索我国鲁迅研究自身的“中国性”时的“参照系”。而从正文中也能够看出王士菁对待日本鲁迅研究的这种态度。王士菁《鲁迅传》的一大特点就是旁征博引,其中也不乏许寿裳和王冶秋等人的传记文章。但在标注的引用文章中,却偏偏没有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且不说这本传记是王士菁在创作《鲁迅传》时能参考的唯一一本完整的鲁迅传记,就是从许广平的序言中我们也能看出国内鲁迅研究者对于小田岳夫《鲁迅传》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刻意不引用其内容,恰恰反映了当时国内研究者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当作“参照系”而非“榜样”的心态。但与此相对的是,我们在王士菁的《鲁迅传》中依然能够明显看到对于小田岳夫的正面继承。

如朱文华所言,小田岳夫对于王士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的基本线索”上(22)。这一点对比两者的目录部分便可看出。王士菁的《鲁迅传》共十章,其中与小田岳夫的《鲁迅传》重合的就有六章之多。此外,尽管书中所引史料较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要丰富得多,但基本脉络则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尽管王士菁在内容上可以从国内的传记类作品中寻找资源,但传记的结构依然只能参考小田岳夫的。

此外,王士菁的《鲁迅传》在笔法上也受到了小田岳夫的诸多影响。许广平在序言中虽肯定了王士菁将“中国历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鲁迅生平经历,从头正确地,客观地寻找出它的所以然”,但仍有对鲁迅原著“引证过多”等“小疵”(3)。朱文华则指出,“每章开头先用一、二节文字来介绍时代背景”,致使“笔法单调,机械,知识背景材料未能同叙述鲁迅生平思想密切有机地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传记内容的整体感”(23)。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鲁迅研究者指出的王士菁《鲁迅传》之不足,却恰恰与小田岳夫在《鲁迅传》中依靠鲁迅全套著作进行取舍和选择并将鲁迅在各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状况纳入其中之笔法相契合,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士菁在笔法上对于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借鉴。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对于王士菁及我国1940年代鲁迅研究的最重要的影响,乃是其带来了一种日本式的鲁迅观。国内鲁迅研究者则借助这种观点将自身的研究客观化,并在对其或呼应或批判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带有强烈主体性的中国式鲁迅观。上文已经提到,范泉在翻译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时对其不认同的观点进行了删改,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此时产生的中国鲁迅观对日本鲁迅观的回应。而范泉通过对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删改体现出的这种中国式鲁迅观的某些元素,在王士菁的《鲁迅传》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这种鲁迅观首先体现在对于鲁迅身处的历史语境的认知上。例如小田岳夫在提及直奉战争等历史事件时,仅仅将其当作军阀派系之间的斗争来描写,且大都一笔带过,但王士菁则突出了军阀背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存在,强调军阀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小田岳夫这种避重就轻的写法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也体现出日本研究者存在着某些由于历史文化的隔阂而难以避免的历史观上的盲区



和误区。而王士菁对于帝国主义的强调,则相应地构成了我国鲁迅观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历史观之外,王士菁还继承了范译本中一些删改所体现的中国式鲁迅观的要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鲁迅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文已经提到,范泉修改了小田岳夫关于鲁迅国学修养的内容,而范泉的观点在王士菁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王士菁在《鲁迅传》首先认为鲁迅抄录古籍的工作并非是一种对古典文化的主动接受,而是在“不可不驱除的寂寞”中“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沉到平凡的生活”的方法(82)。此外,王士菁也将鲁迅与复古思想的斗争作为其论战的一大主题加以描写,突出了鲁迅在反对旧文化这一点上的思想一致性。反观小田岳夫认为鲁迅思想存在前后矛盾的观点,也许是因为他将日本近代文学的继承性投射到了鲁迅身上,低估了鲁迅面临的历史状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旧文化决裂的决心,其中反映的依然是一种日本式的鲁迅观。而王士菁在写作中对于有关内容的突出,恐怕也是因为他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作为参照系的缘故。

综上,王士菁的《鲁迅传》在具体内容上以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为参照系,回应其观点而避免对其进行直接引用,而在结构和笔法上却又对其进行借鉴。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1940年代国内鲁迅研究丰富的史料积累和贫瘠的传记创作经验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在结构和笔法上,为我国早期的鲁迅传记创作提供了重要范本。

结 语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在“大东亚”思想之语境下将鲁迅的生平和经历介绍到日本,又经由国内译者之手回到国内,并且对我国1940年代的鲁迅研究产生了影响。在此过程中,鲁迅形象伴随着《鲁迅传》的创作、译介和传播完成了多次历史文化上的越境,可以说是我国早期鲁迅研究“中日互证”之语境的缩影。以王士菁《鲁迅传》为代表的我国早期鲁迅研究便是在“中日互证”的语境下,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内鲁迅研究相对化的同时,又通过对以小田岳夫《鲁迅传》为首的日本鲁迅研究成果的关注和批判,获得了一种相对客观的研

究视角。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早期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致谢【Acknowledgment】

本文受益于《现代传记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I am grateful to the editor of *Journal of Modern Life Writing Studies* and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段晓芳、郭增卫：《霍尔高低文化语境理论的现实阐释——解读“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4期，第44-48页。

[Duan Xiaofang, and Guo Zengwei. "An Explanation on the Chinese Way of Crossing th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ll's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Theory."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s)* 4 (2023): 44-48.]

范泉：《鲁迅传断片》，《文艺春秋丛刊》1944年第2期，第70-74页。

[Fan Quan. "Fragments of Mr. Lu Xun." *Bungeishunju Collections* 2 (1944): 70-74.]

——：《关于〈鲁迅传〉》，《文艺春秋》1946年第3卷第4期，第49-53页。

[Fan Quan. "About Lu Xun: A Biography." *Bungeishunju Magazine* 4 (3): 49-53.]

古大勇、翟勇：《论小田岳夫〈鲁迅传〉两个中文译本的差异——兼谈许广平在塑造鲁迅形象方面的作用》，《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2期，第35-42页。

[Gu Dayong, and Zhai Yong.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Lu Xun's Biography by Takeo Oda: Concurrently on Xu Guangping'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Lu Xun's Image." *Luxun Studies Monthly* 12 (2022): 35-42.]

李文卿：《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满系文坛与文艺》，《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第43-47+53页。

[Li Wenqing. "Post-Lu Xun: The Manchu Literary Scene and Literature of the 'War Period (1937-1945)'"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6(2014): 43-47+53.]

钦鸿：《〈文艺春秋〉对鲁迅的纪念与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第43-47页。

[Qin Hong. "The Commemoration and Research of Lu Xun in *Bungeishunju Magazine*." *Luxun Studies Monthly* 6 (1990): 43-47.]

钦鸿、闻彬：《论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的编辑艺术》，《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73-76+24页。

[Qing Hong, and Wen Bin. "On the Editing Art of *Bungeishunju Magazine* edited by Fan Quan."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6 (1990): 73-76+24.]

任鹤鲤译本：《鲁迅传》，小田岳夫。上海：星洲出版社，1945年。

[Ren Heli, trans. *Lu Xun: A Biography*. By Takeo Oda. Shanghai: Xingzhou Press, 1945.]

单外文译本：《鲁迅传》，小田岳夫。长春：艺文书房，1941年。

[Shan Waiwen, trans. *Lu Xun: A Biography*. By Takeo Oda. Changchun: Yiwen Bookstore, 1941.]

小田岳夫：《鲁迅传》，范泉译。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

[Takeo Oda. *A Biography of Lu Xun*. Trans. Fan Quan.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46.]

小田岳夫：《鲁迅先生的一生》，夜析译。北京：艺光出版社，1945年。



[Takeo Oda. *Lu Xun: A Biography*. Trans. Ye Xi. Beijing: Yiguang Press, 1945.]

小田嶽夫：《鲁迅伝》，東京：筑摩書房，1941年。

[Takeo Oda. *Lu Xun: A Biography*. Tokyo: Chikuma Shyobou, 1941.]

王士菁：《鲁迅传》。上海：光华书店，1949年。

[Wang Shijing. *Lu Xun: A Biography*. Shanghai: Guanghai Shudian, 1949.]

许广平：《序言》，《鲁迅传》，王士菁。上海：光华书店，1949年。

[Xu Guangping. "Preface." *Lu Xun: A Biography*. By Wang Shijing. Shanghai: Guanghai Shudian, 1949.]

徐利：《“爱国者”的背面——论小田岳夫〈鲁迅传〉中的鲁迅形象及其塑造逻辑》，《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34-42页。

[Xu Li. "Behind the 'Patriot': On the Image of Lu Xun and Its Shaping Logic in *Lu Xun: A Biography* by Takeo Oda."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2 (2022): 34-42.]

肖振宇：《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沦陷区的传播——以东北为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36-38+41页。

[Xiao Zhenyu. "The Spread of Lu Xun and His Works in the Occupi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2012): 36-38+41.]

朱文华：《关于鲁迅传记编写的几个问题——兼评国内已出版的鲁迅传记》，《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22-28页。

[Zhu Wenhua.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Lu Xun's Biography: Comments on the Published Lu Xun's Biographies in China." *Journal of Jinzhou Normal University* 1 (1982): 22-28.]